

德宏史志资料

第十九集

德宏史志编委会办公室

编

ခရိုင် မြို့ခံ ခရိုင် မြို့ခံ ခရိုင်

Sakhkung labau sumhting laika

德宏史志资料

(第十九集)

主 编 吴志湘

封面设计 李开明

德宏史志编委会办公室 编

德昂族青年表演队欢度泼水节



朝气蓬勃的傣僮青年



德昂山村



欢度泼水节德昂族舞队



节日期间的阿昌妇女



参加泼水节的傈僳青年



编辑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我州各地区、各部门开展编史修志工作的需要，我们根据德宏州史志编委会的决定，着手编辑这套《德宏史志资料》丛刊，陆续分集出版，内部发行。从现在开始，计划每年出二到四集，每集二十五万字左右，大约分二十集，预计在七、八年时间内出完。

编辑、出版这套资料丛刊的目的，一是可以不断地积累和永久地保存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德宏地方史志资料，传之永久，使一些珍贵的孤本、善本资料，特别是用各种民族文字记载的稀有资料不致失传，能够为今后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为进一步研究德宏地方史和民族史服务；二是通过系统收集、整理德宏地方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社会、人文的全面资料，可以给当前的四化建设提供某些决策信息，寻求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三是可以为全州正在开展的编史修志工作提供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以便大家对有关的历史事实进行考证、鉴别和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收集和编辑、整理资料，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工作，没有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可靠资料，就谈不上编史修志。这套资料丛刊，大体上就相当于德宏地方史和地方志的“长编”或“资料类编”，完成了这项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就给德宏地方史（包括地方党史）和地方志积累了主体资料，提供了大量素材，为正式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州系祖国西面边疆的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解放前长期隶属内地府、州、厅、县管辖，历代没有形成过系统的地方史志书籍，文字记载也较少。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新划定的行政区域，因此，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是一件开拓的新工作。由于我州史志工作开展时间还很短，加上我们知识浅薄，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还很不完整，要编辑出版一套史料丛刊，困难还很多。迫切希望各地史志工作机构、专家学者以及史志工作爱好者、关心编史修志的热心人，多给我们支持、帮助和指导，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或推荐，介绍有关记载德宏地区的史志资料，我们和广大读者将深为感谢。

对于编辑出版德宏史志资料丛刊的有关问题，现作如下说明：

一、本刊收录的资料，以涉及德宏地区的历史事实为主。有的事实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德宏，但与德宏有关，或者在历史上曾与德宏属于同一行政地区的有关资料，则作为附录一并选编收录，以求得资料的完整和系统，便于查照参考。

二、本刊资料，重点选录当地珍藏的有关记载德宏史事的孤本、善本资料，特别是翻译整理当地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如有关地方史事、民族史事的文书、档册、传抄本，以及家谱、私人著述、日记等等；对于已经登载在各种书刊上的有关德宏的史

料，凡有参考和使用价值的亦酌量选编收录在内。

三、本刊资料的编排，以现时已收集到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和内容归类分集编辑出版，对于字数较多一集容纳不了的同类资料或在分类刊出又征集到的新资料，则分别选编，以后继续刊出。

四、本刊收录的古代和近代的各种史料，由于著述者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同历代史书一样，不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甚至反动的民族观。他们否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肆意诬蔑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他们宣扬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对历代封建统治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他们或者往往以大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歧视、污蔑少数民族，也有的以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记述民族关系问题等等。由于为了全面保存史料的原貌，对这类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的称谓，本刊除酌改“𠂔”旁为“亻”旁外，其它有歧视性的称谓或古今称谓有歧异的，均照录原文，不加改动。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限，对于错误的以至反动的立场观点，没有逐一加以批注。请读者阅读和引用时，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加以鉴别。

五、本刊选编的史料内容，均按原文照录。其中，有的史料记载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有的前后史料记载的内容有矛盾或差别，有的史料史学界有争论，我们辑录原文并不意味赞成其观点。有的材料人名、地名译音及时间、地点有歧异，有的原文有错讹、颠倒、重复、遗漏之处，我们除对原文的错、倒、脱漏及明显差错稍作校勘外，其它均从原文，不作史实的考证校订。以上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加以考证。对于历代各种史料有某些内容重复的，也一般按原文一并刊出，以便于从多方面考证史实。

六、历代史料有很大部分系文言文，原文不分段落，也没有断句、标点。本刊选录时，均按原文内容和现代文法划分段落，加以断句，并使用现代通用的标点符号。对于原文在正式出版的书中已有分段和断句、标点的，我们则继续沿用，不再变动。分段和断句、标点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七、史料原文一般使用旧年号，本刊编录时，在旧年号后面用括号标明公元年号，以便查考。

八、为了方便阅读，原文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用现行的简化字及通用字。

对于选录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加上知识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多给批评指导，以便今后不断改进工作。

德宏州史志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编 德昂族

德昂古史钩沉 桑耀华 (3)

- 一、历史源流 (3)
- 二、滇人及昆明人的衰落 (9)
- 三、茫蛮部落及金齿国 (11)
- 四、古代孟人的军事活动与兵器 (13)
- 五、茫人部落的行政机构 (18)

德昂族历史源流探索 杨永生 (21)

- 一、德昂族属于云南古代三大族群中的濮人族群 (22)
- 二、德宏历史上的“腊”“养”“碧”人 (27)
- 三、德昂史中的几个问题 (36)

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 (62)

- 潞西县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 桑耀华整理 (62)
- 潞西县三台山德昂族迁徙传说 赵华江 杨秀芳等 (75)
- 潞西县邦外、瑞丽县广双芒海德昂族社会调查 宋恩常整理 (78)
- 潞西县三台山德昂族政治经济调查 杨毓骧 (83)
- 潞西县邦外德昂族文化调查 杨毓骧 (88)
- 陇川县章凤区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 桑耀华等 (104)
- 盈江县城区户回乡松山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 桑耀华等 (108)
- 德宏州德昂族小乘佛教调查 杨毓骧 (111)

德宏德昂族遗址拾零 桑耀华 (122)

- 一、潞西遮放莫列遗址 (122)

二、潞西县轩岗坝芒乱别崩龙族遗址	(124)
三、女王宫遗址	(125)
四、允弄(大城)遗址	(126)
五、允崩龙遗址	(127)
六、松山拱姆遗址	(128)
七、庄崩龙遗址	(128)
八、邦瓦遗址	(129)
九、王子树崩龙族遗址	(129)
十、总坎遗址	(130)
十一、拱瓦、邦外等遗址	(131)
十二、盈江县境内部分崩龙族遗址	(131)
十三、户育崩龙族遗址	(135)

德昂族史料摘抄 桑耀华 (138)

一、汉至唐的“仆(濮)人”、“茫蛮”、“扑子蛮”、“望苴子”	(138)
二、元代的金齿、蒲满(蛮)	(140)
三、明代的“蒲人”	(149)
四、清代的崩龙(波龙)养子	(150)

第二编 阿昌族

阿昌族历史简述 桑耀华 (163)

一、族源及民族形成	(163)
二、历史演进与发展	(164)
三、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	(165)
四、土司制度下的阿昌人民	(166)

阿昌族的由来和发展探索 杨 浚 (168)

一、概况	(168)
二、阿昌族也应是云南的土著民族	(169)
三、哀牢夷与浪峨的关系	(171)

四、“僑”与“寻传”和阿昌族之间的关系	(173)
五、古浪峨地的形成及其范围	(175)
六、阿昌族先民与南诏的关系	(177)
七、南诏浪峨人退出洱海区域的经过	(181)
八、明清以来的重大事件对云龙阿昌族的影响	(184)
九、“东浪宋地”和“西浪宋地”的历史概况	(187)
十、浪峨人在怒江境内留下的居民点	(191)
十一、茶山、里麻两长官司的兴衰	(193)
十二、载瓦人唯一的土司政权——瓦甸长官司	(195)
十三、阿昌族的最后一个土司政权——明光、茨竹土守备	(197)
十四、阿昌族在腾龙边区定居的史况	(199)

阿昌族文化 曹明强 马向东 (204)

一、概述	(204)
二、宗教信仰	(206)
三、卜卦	(210)
四、家庭、家族和村社组织	(211)
五、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	(212)
六、音乐舞蹈	(213)
七、民间工艺	(215)
八、名胜古迹	(216)
九、风俗习惯	(216)
十、著名人物	(224)

阿昌族宗教信仰 桑耀华 (226)

一、原始宗教	(226)
二、佛教	(230)
三、道教	(231)

户撒乡阿昌族的鬼神崇拜 桑耀华 (232)

第三编 傈僳族

傈僳族史料综叙	宝山屹 (237)
解放前傈僳族社会发展状况	木劲松 陈佳荣 (261)
保山地区傈僳族	莫 知 (271)
德宏州的傈僳族	段月华 (275)
傈僳族服饰	胡玉兰 (280)
傈僳族民间文学及音乐舞蹈	李卫才 (286)
傈僳族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木永生 (294)

附 录

一、德宏州阿昌、德昂、傈僳集中和分散居住的村寨	夏 玲 杨丽梅辑录 (299)
二、明季浩封世守漕涧武节将军墓志铭	杨 波 征辑 (302)

后 记	编 者 (304)
-----------	-----------

第一编 德昂族

德昂古史钩沉

桑耀华

18世纪下半叶，缅甸雍籍牙王朝派兵攻占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在向东扩张的同时，发兵北上侵扰云南边境勒索银米，掳掠居民，因而引发中缅冲突，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767—1769）期间，清朝曾两次派军队进入云南边境及现今缅北的部分地区。在军队的一些禀报及行文中开始见到崩龙（波龙）这个民族称谓。以后光绪永昌府志有“崩龙，类似摆衣，惟语言不同，男以背负，女以尖布套头，以藤篾圈缠腰，漆齿、纹身，多居山巅，土司地皆有”的记载。崩龙是较晚出现于我国史书的一个民族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进行了民族识别，承认他们为我国单一民族，并延用“崩龙”这一称谓，1985年改称“德昂”。

德昂，作为单一民族出现的时间虽晚，但他们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一、历史源流

1、南亚语系民族渊源

德昂，属南亚语系民族，是古代孟高棉族群后裔的一部分。关于南亚语系民族的古代居民，有的认为来自印度，有的认为是在中南半岛发展形成的。我国著名的云南民族史专家方国瑜教授认为：孟高棉族群和马来人同属南亚语系，住在中南半岛的南部，一定很古。在早期中南半岛上孟高棉人的势力最大，这是他们定居在这个区域经过很长时间发展的结果。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从广义马来人的角度提出：他们是蒙古利亚海洋系，印度尼西亚人和矮黑人混血后形成的民族。更多的人认为，孟—高棉人是云南及东南亚地区的土著民族，很早便生活在这里。陈显泗教授说：“孟—高棉人可能是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s）和印度尼西亚人（Indon'esians）经混合而产生的一个民族，他们分布的区域很广，东起中国南海海岸，向西直达印度边境，包括了东南亚很大一部分地区。”^①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复旦大学在《布朗族体质形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他们具有蒙古人种较多南亚类型成份，并融合“傜僇（矮黑人）”的成份。”德昂族、布朗族、佤族都是古代孟—高棉人后裔的一部分，这个结论对德昂、佤来说也是实用的，与以往人类学家研究结论也是相契的。因此，一般都认为德昂先民——孟高棉人——从远古时期就生活繁衍在中南半岛、云南等地区，是土生土长的，历史悠久的族群。

2、古莽之国

^① 陈显泗《柬埔寨两千年史》第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列子》周穆王篇载：“西极之南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岑仲勉先生认为：“战国时称西极之南隅”释为云南“是恰当不过的”。笔者认为“古莽”即“猛”，正如唐至明、清云南南部将猛（孟）写作“茫”、“莽”是一样道理。所以，我们认为“古莽”与明、清时永昌、顺宁地区的“莽”人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有说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来，可能是晋人作品。但从“古莽之国”的记载看，即使今存《列子》中有晋人语言、思想成分，但一些原始材料自然是源于战国时的《列子》。又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看，该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朗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关于靡、莫之属的族属，学术界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是在“氐羌、越、濮”中选择；云南古代就是羌、濮、越三大族群互相杂处之地，所以从这些民族中找关系是常理。

靡、莫之属，笔者认为靡即“緬”。公元458年立的《爨龙颜碑》自谓“系出于半（緬、楚姓）”《拉祜族简史》说《爨龙颜碑》有“緬戎冠场”句……澜沧江以西傣族多称拉祜为緬。傣语称临沧为勐緬”，拉祜语按四字联名叫“勐緬密緬”，都是緬人地方。汉族随傣族称拉祜为“老緬”。莫即“猛”孟的异写。滇池区域有“猛”（孟）人居住，从后来的一些记述中也可找到线索；康熙《东川府志》记载：“孟人，亦靡、莫种，蜀汉孟炎（孟获同族）部民，也有赵、苏、李、钱、冯、十、金、杨、王、吴诸姓。当诸葛亮南征，斩雍闿，释孟获，擢炎为辅汉将军，召诸蛮赐以汉姓，祠炎于金钟山下，岁时祭祀。”“甘人，靡、莫别种……男子椎髻帕首……”。又据《元史·地理志》河西县（今通海）载：“县在杞麓湖之南，夷名其地曰休腊，昔庄跻王其地。”又说“天宝后没于蛮（南诏），为步雄部。后阿𪚩蛮易渠夺而有之，元宪宗六年（1256）内附，七年即阿𪚩部立万户，休腊隶之。”休腊，当休腊（佤）人住居而得名，西汉时曾在这里设“胜休”县，王莽时更名“胜𪚩”（《水经》卷三十六温水注），含有战胜𪚩人之意。也说明南诏时步雄部占据之前，这里是休腊民族即（佤人）和𪚩人住居的。对于休腊人即佤人这一点，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更为明确，该书陆良州建置沿革载：“蛮云休纳（腊的近音字），又名瓦子，讹为瓦作。”腊（纳）是佤人的又一名称，今日依然如故，明、清时的史书仍称瓦族为“隸腊”、“哈腊”、“哈喇”、“卡腊”等。《史记·西南夷传》载：“元封二年（前109），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这里的“劳浸”与德昂支系“饶金”（饶进）音同，是否有关是值得探讨的。张增祺教授在《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一书中说：“大石墓，即《华阳国志》所说的‘濮人冢’，此‘濮人’就是《史记》、《汉书》所说的‘苞蒲蛮’，属南亚语系孟—高棉民族。”这些史料及论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线索：古代，从东川、会泽、寻甸（元时还有孟人）、陆良、通海（河西）及滇池区域住居着相当数量的南亚语系的居民。

3、孟—高棉先民在云南开创了一个青铜时代

《史记·西南夷传》载：“南夷君长以十数，夜朗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这个记载是很简略的，但本世纪中期，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发掘到一批从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青铜器物，内容却很丰富，它对这时期滇池区域民族的社会生活、阶级状况、战争场面、劳动生产、祭祀活动等方面都栩栩如生地作了表现。从祭祀场面看，滇人具有以

蟒蛇为图腾，祭祀时树立图腾柱，以铜鼓为神器的文化内涵。如贮贝器(M12:26)盖面上，在两铜鼓之间，左立一铜柱，柱上蟠蟒蛇二条，柱脚所盘的巨蟒已将一人吞食一半，仅胸首还露于外。平台前当梯处竖立一牌，上宽下窄，有一蛇蜿蜒而上。还有一些铜饰物的下端，都有一条或两三条蛇，有的蟠于牛、马足下，有的被踩在孔雀足下。有些青铜剑、剑柄及剑鞘上也刻画一两条蛇。总之，在滇人的祭祀场面、工艺品、装饰物上多有蛇的标志，以至汉王朝封滇王颁发的金印印钮也是选用蛇（参见《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又《东观汉记·梁冀传》说“永昌太守冶铸黄金纹蛇献翼”这反映了东汉时期今保山地区的民族和滇人一样，对于蛇有一种特殊观念。有学者说：“蛇图象的出现，在石寨山青铜上是比较频繁的，这类器物粗略统计不下百余件，除多数是作为装饰题材外，也有20余件是在人物或动物活动场面中被置于显要或特殊位置上。”^①在柬埔寨，九头蛇成了高棉民族的神圣标志。元时，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载说：“土人皆为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必见。国主则与之同寝交构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近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此外，印度阿萨姆的卡西族与缅北和云南的佤、德昂、布朗为同一语系，他们“有一种迷信，说是有一个名叫‘VThLen’的巨蛇，只有用人作牺牲，向它祭献，才能使它满足。”而这种蛇崇拜是柬埔寨人的宗教信仰的特征，正如福帕斯说的，它“无疑是孟（Mon）族最早的宗教信仰”。（朱昌利译《印度东北地区部族生活》，载《南亚译丛》1984年第二期）。以上材料说明崇拜蛇是古代南亚语系民族共有特征，蛇是他们的图腾物，是土地之主，是他们的原始宗教崇拜的核心。这一点与百越民族崇拜、祭祀蟾蜍（蛙类）、氐羌民族崇拜虎（彝族崇拜虎、白族崇拜白虎）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我们在出土器物上也可以看到蛙立体的或平面刻绘的蛙和虎的形体，但这些都滇人的祭祀与文化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而且出现时间要晚一些），占主导地位的是蛇、图腾柱、铜鼓。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古滇文化是以南亚语系民族先民为主创造的。从春秋、战国至西汉时，即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前一世纪这时期，南亚语系民族先民为云南开创了一个青铜时代，他们留下的青铜器物代表着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发展阶段。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滇池区域有较多的羌、越民族杂居其间，也不否认楚文化、羌、越文化的影响，只是强调滇人的原始宗教信仰祭祀、崇拜蛇、立铜柱这些特征是属南亚语系民族的特征，而与羌、越有明显不同。

这里需要作补充的是，蛇这种动物，它适应性强，对生态条件要求不高，世界大多数地区都能生长，许多古代民族都把它当作图腾物崇拜。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国。郭璞注：“其人人面蛇身”。《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说传说中的伏羲为“蛇身人首，有圣德”。但这些似乎都是氏族社会的图腾物，到部落、奴隶制时期已渐消失，至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有：“造筑大城……立蛇门者，以象地产也”。“立蛇门，以制敌国。”这里的蛇象征国土，以制敌国，作为国家民族保护神这点与滇人、古代柬埔寨人有共同之处，值得深入研究。

① 黄美椿《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蛇图象试释》。

4、关于濮人

再从濮人考察，史书对濮人的记载，从时间上说是比较早的，地域也比较广。如：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贯胸、雕题（纹额）、离身（纹身）、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纣鬬、江历、龙角、神龟为献（《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王（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尚书·周书·牧誓》），又“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沙，夷用鬯木，……州靡费费（狝狝）。（《逸周书·王会解》）“叔熊逃难于濮而蛮”，“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国语·郑语》）。《汉书·地理志》载：“仆水出徼外。东南至来唯入劳”。“牛兰山，即水所出，南至双柏入仆”。“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龙入仆”。杜预《春秋释例》载“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华阳国志·南中志》对云南境内的濮人就有较多记载：“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緬）、濮之乡”。“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兴古郡……多鸠僚、濮”。“建宁郡……谈稿县有濮、僚。”永昌郡内对濮人的记载就更多了，如：“有闽（緬）、濮、鸠僚、僰越、裸濮、身毒之民”。有“闽（緬）、越、濮、鸠僚，共帅皆曰王。”“有大竹名濮竹”。“李恢（从永昌）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郡界，以实二郡”。“元康末，值南夷作乱，闽（緬）、濮反”。《三国志·蜀志》说“广迁蛮濮，国用富强”。“赋出叟濮”。此外，《太平御览》等书还记载永昌郡有尾濮、木棉濮、折（缠）腰濮、赤口濮等。以上史书所记载的濮，有的主张他们是同一族群，董难《百濮考》就认为“濮人即今顺宁蛮”。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也认为“明、清职贡，永昌、顺宁皆贡濮竹，而顺宁专贡矮犬，与《王会》百濮献短狗相契。”方国瑜教授在论及“永昌濮族的种属问题时说：“据董难《百濮考》，王崧《云南备征志·叙录》、朱希祖《云南濮族考》诸书认为就是古时的百濮，但从记录上很难证明“永昌濮”就是百濮，不能以名称用字相同混为一谈”。并认为“商、周之濮”，“楚国之濮”，“巴郡之濮”与永昌之“濮”除名称用字相同以外，还不能证明他们有何关系，“并不能以名称用字相同强释为同族”，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迹线可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布朗族简史》也认为“江汉以南之濮、巴蜀之濮和黔西南等地之濮与……永昌之濮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就语言方面考察，永昌濮是属于孟高棉族系，而江汉以南的川、黔、滇、桂接壤一带之濮却属于百越语系”。《佤族简史》认为“东汉时期居住于哀牢地区的“濮”族，当即后来史书所记载的“朴子蛮”和“蒲人”，也即是佤德语支各族的先民”。以上所引著作认为江汉之濮、永昌之濮，这两者之间尚未探索到其中的必然联系，但章太炎提出的云南顺宁蒲人直到明、清时仍然向中原皇朝贡“短狗”（矮犬）的问题值得重视。又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五霸”、“七雄”之一，与川、黔、滇有较多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确是事实，楚将庄蹻“王滇”就是一例。此外楚国重要民族苗、瑶，其自称与今日云南一些民族的称谓相近。如苗族自称“蒙”，与孟、猛近，瑶族自称“勉”，与缅同音，以后《华阳国志·南中志》还把“滇国”称为“滇濮”。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名称相同不一定是偶合，可能与楚国进入云南的军队有关，庄蹻的

军队，虽然“变服从其俗”，但他们比当地土著居民先进，甚至居于统治地位，受其影响的可能是较大的。

汪宁生教授认为：“把各个地区濮人作为同一种族看待，把他们联系进行统一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正确的。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各地濮人是同名而实异，江汉之濮与西南之濮是完全不同的族。这一点则非我们所敢同意。各地濮人接受内地文化有早有晚，程度有深有浅，加之受地理环境的制约，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面貌可以有所不同。但既然同称为濮，应该说在种族上有着共同的渊源”。（《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版）

5、孟获的族属

孟获是古代哪个语系民族，《三国志》及当时的一些史书未见记载，但因他是滇池区域的大姓，是“夷汉所并服”的领袖人物，后世的彝、傣、蒲人及其他一些民族中，都有孟获是本民族先民领袖的传说，湖南融水县有一石碑刻有孟获像（见刘锡蕃《岭表纪蛮》一书），广西自治区莱水县黄果树附近还有一个孟获村。清《一统志》说：“孟获城在宁远（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城东二里，孟获所筑。《读史方舆纪要》也有类似记载。当代也有些学者论证孟获为汉族大姓首领，或为古代彝族首领。然而，在云南说孟获与蒲人有族属关系的记载较其他为多。明时杨升庵所著《滇程记》在蒲蛮哨下记载着：“蒲蛮，实孟获之遗种也”。又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在游历顺宁（今凤庆）时，对当地民族作过调查，并在游记中写道：“顺宁，旧名庆甸，本蒲蛮之地，……土官猛姓，即孟获之后。”续修《顺宁府志》也说：《滇记》、《旧云南通志》、《一统志》都记载今凤庆城南有孟获村遗址。因此，孟获属两汉、三国时滇中的孟（猛）人是有可能的。

6、洱海区域的昆明（克仑）人

《史记·西南夷传》载：“西至同师以东，北至牂牁（洱海区域）名为雋、昆明”。岑仲勉先生认为：“柬埔寨人自名其国曰 Khmer，在占文碑铭中作 Krir 或 Kmīr，占语作 Kur，大食人名曰 Gomar，现时暹罗人习惯写作 Khmer，音读则为 Khamer，越南人称曰高棉；我国则唐慧超五天竺国传译为阁茂，《旧唐书》、《新唐书》译为吉蔑。试参合各国不同的读法，此名在古代汉语得转为 Kuan men，即“昆明”音所写自本，干脆一句话，昆明族是迁转到中南半岛去。”（见岑仲勉《据〈史记〉看出緬、吉蔑（柬埔寨）、昆侖（克仑）、暹罗等族由云南迁去》一文，载《中山大学学报》1959 年第三期）。该文又说：“甚至现在，吉蔑系还留了少许人如崩龙（原作“竜”（PaLaung），在云南极西边境。崩龙我认为即勃弄的遗民，《隋书》五三史万岁传，‘入自蜻蛉川，经弄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小南中。’《蛮书》五，‘白崖谓之勃弄险’，又‘（蒙舍）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勃弄川今礼社江，盖因受他族压迫而避往滇西，亦即是赶不上大队而留落在后的。”前引《中国西南考古》又说：“从大量考古资料，也说明昆明并非原自西北地区的羌人，而是活动于怒江、澜沧江河谷的土著民族。”作者未说明这些土著民族的后裔是哪些民族，但一般都认为是南亚语系民族先民。汉时大理至保山的古道称“博南古道”，永平至澜沧江边的山称博南山，永平在东汉时称博南县，也有认为“博南”即“布朗”的谐音。专家学者们的这些研究成果，不论从史籍记载，亦或从考古发掘所得